

酒罢问君三语

羽戈◎著

那年我十八岁，满眼韶华，却从不敢筹划未来。如今我三十岁，而立之年，一事无成，身心俱疲，我常常沉溺于对未来的狂想之中，不愿抬头，束缚我脖子的现实的镣，冷硬而无以下口。而我曾经是多么喜欢仰望星空，头仰断了，都不低下来。



YZLI0890140059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寻路文丛

酒罢问君三语

羽戈◎著

那年我十八岁，满眼韶华，却从不曾想到未来。如今我三十岁，而立之年，一事无成，身心俱疲，我常常沉湎于对未来的狂想之中，不愿抬头，束缚我脖子的现实的锁，冷硬而无以下口。而我曾经是多么喜欢仰望星空，头仰断了，都不低下来。



YZLI0890140069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酒罢问君三语 / 羽戈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80743-918-9

I. ①酒… II. ①羽…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7409 号

酒罢问君三语

羽戈 著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责任编辑 吴 波 王晓君
内文设计 金字斋书刊设计服务中心
电 话 0574-87242865(发行部) 0574-87341015(编辑部)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60 千
版次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918-9
定 价 28.00 元

序

“偶像破坏者”的教育与自我教育

古人言“三十而立”，羽戈在而立之年迎来了第四本著作的出版，让人深感钦佩。在这几本书中，《百年孤影》或许最能反映羽戈的学识和思想深度，也是他最用心力写作的文字。但是，与他关于宪政史的文字相比，我却更喜欢他的那些随笔，既不乏学识和幽默，又读来让人感动。在历史研究中，羽戈的心灵像一束折射的光，只有从复杂的叙事、分析和评论中才能曲折地窥视；而在随笔中，则像一束反射的光，更直接而清晰地映照出他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那些为公共领域而作的文字背后的困惑、探索和希望。与《从黄昏起飞》和《穿越午夜之门》相比，《酒罢问君三语》似乎显得更加随性和私密，更清楚地展露了羽戈“起飞”和“穿越”中的那些怕和爱，可谓我们认识和了解羽戈的最佳门径。

“三城记”记述了对羽戈具有生命意义的三个城市的些许剪影：阜阳、重庆和宁波。故乡、母校原本是让人感到温暖的语汇，然而，在羽戈的回忆中，却弥漫和浸透着沉重和苦涩。“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沉沦”、“伤心岂独西政人”，固然略有夸张，却映射着社会的现实。这种社会现实所导致的最为紧要的后果之一，就是教育的失败，以至于每个有自我意识的学生都不得不在这种失败中学会自我教育。

羽戈曾在一首诗中问道：在一个沦陷的城邦，你愿为谁的鬼魂守夜？他的回答是：正义和命运。自我教育的动力就来源于对社会现实的理解、

对社会苦难的同情、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正是这种信念让他能够从本雅明的那段著名的话中获得行动的力量：“不管我们所托付的东西的未来是多么不确定，今天我们成功地出版出来的每一行字，都是从黑暗力量的手中扳过来的一个胜利。”

一个教育失败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偶像的黄昏”时刻。在这一时刻，扑面而来的是虚无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将精神和社会变得荒诞化和喜剧化。在对偶像的分析和批判中，羽戈逐渐走出了偶像们的巨大阴影，从而完成了自我教育，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偶像破坏者”。在虚无主义的时代，成为一个“偶像破坏者”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但是，与那些冷漠、伤感、悲观和沮丧的虚无主义者不同，羽戈拒绝成为一个静寂主义者、犬儒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恰恰相反，羽戈选择了以一种坚韧的精神力量去面对和拥抱这一艰辛而冰冷的现实，这是对理智和命运最深沉的爱。

在对抗虚无的过程中，羽戈逐渐回到了历史研究，并成为了一个“宪政主义者”。当然，“偶像破坏者”不是历史的囚徒。因为这种历史不是宏大的、法则式和命令式的历史，而是微观的、碎片化的和叙述性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卑微的、边缘化的和受苦的人也获得了存在的尊严和权利，而宪政主义可谓这种尊严和权利的守护者，由此可以明白羽戈为何以“历史与宪政”作结全书。

乍看之下，羽戈对宪政主义的理解似乎缺乏理论深度。既没有详尽地去理解宪政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也没有深入地探究宪政主义得以可能的元理论前提和条件。相反，那些宪政主义传播中“南橘北枳”的苦果，得到了他更多的关注。羽戈认为宪政主义的精神内核是“法治为骨骼，自由为细胞，民主为血液，分权为肌肉”，但也没有充分地分析这些观念之间内在的张力。然而，正是在这种“肤浅”中恰恰蕴涵了对宪政主义的深刻理解。用羽戈的话说，就是“回归常识，回归形而下”。毕竟，宪政主义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理论，它的折中和自我矛盾源于这个世界自身也是自我

矛盾的。对这个混乱的世界的任何一种系统化的、“审美式”的解释无不是对这一世界的曲解。更可怕的是试图将这种曲解转化为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强加于这个世界,从而成为僭政的开端。宪政主义正是对这种权力意志温柔而坚定的拒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宪政主义是政治世界中的“偶像破坏者”,其任务是摧毁各种“政治剧场偶像”。回到常识和形而下,就是破除偶像崇拜。

然而,不太确定的是,如果宪政主义本身也成了偶像,羽戈又将怎样挥动批判的铁锤呢?当然,在宪政主义还没有成为现实,更没有被偶像化之前,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显得多余。但或许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宪政主义者,并明白宪政主义不是一种教条,而是“驯化权力”和破除权力崇拜的一种行动的精神。

羽戈嘱托我给这本书写篇序言,让我感到高兴而又颇为惶恐。自2002年夏天结识以来,尽管在跋涉的路上,我们曾多次擦肩而过,但正如羽戈告诉我的那段爱默生的话那样:“我们相逢之时,仿佛我们素昧平生;我们分别之时,好像我们从未分别。”这篇小文字,是对羽戈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见证。

王恒

目 录

序：“偶像破坏者”的教育与自我教育(王恒)

三城记

父亲 / 3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 9

“白宫书记”案与故乡的沦陷 / 13 在大学 / 16

同学少年 / 23 图书馆 / 47 离歌 / 52

伤心岂独西政人? / 59 我的 2004 年:被禁锢的虚无 / 64

于是人生有度 / 69 酒罢问君三语 / 76 退步青年 / 85

偶像的黄昏

谭嗣同 / 93 史铁生 / 95 李敖 / 99 刘小枫 / 104

苏力 / 117 高阳 / 124 唐德刚 / 137 丹诺 / 141

甘地 / 144 索尔仁尼琴 / 157 师承 / 168

宪政林中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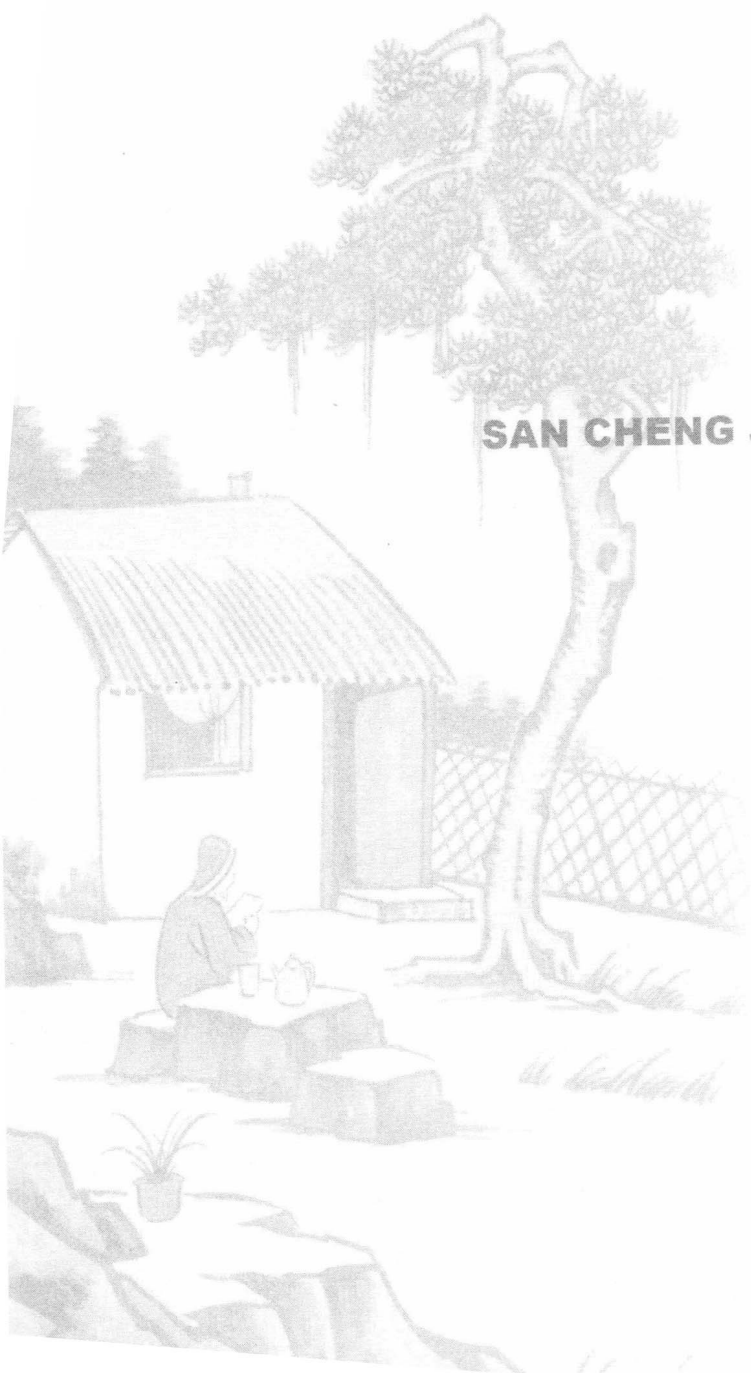
政治与法律 / 175 容忍与自由 / 182 民主与独裁 / 187

平庸的恶 / 194 精英与大众 / 199 签名,还是不签名? / 202

正义之前 / 207 权力 / 235 民国 / 238 历史与宪政 / 249

跋:三十功名尘与土

SAN CHENG JI | 三城记



父亲

2011年6月12日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白居易

父亲诞于农历二月初二，故乡流传俗谚：“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故父亲的名讳有一个“龙”字。今年此日，恰是父亲六十岁寿辰。他早早就说，你们兄妹日子过得都不易，不要庆寿了。家里大小事宜，多由母亲发号施令，他极少主动要求什么，既如此说了，我们则不便违拗。记得那日是周末，我为时事所羁绊，焦头烂额，疲于奔命，直至夜阑才忆起父亲的生日，打电话都迟了，一时无语凝噎。青灯如豆，打开电脑，想为父亲写一点留念的文字，凝思半晌，却始终写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此前，我写过一次父亲，不足五百字，短促如这个时代的噩梦。那是我的第三本书《百年孤影》的志谢，前两本书充满了种种缺憾，我不敢拿来敬献给我的父母，唯恐玷污了他们的声名，他们



父亲与母亲。2009年春节，他们第一次来宁波。摄于天一广场。

平凡至极,但他们之于我的生命却是伟大至极。写《百年孤影》的时候,埋首迷雾氤氲的史料丛中,我常常神思恍惚,眼前飘出父亲消瘦而倔强的身影;修订此书最后一稿的时候,父亲与我的距离仅三五米之遥:

“……2010年春节,近六十岁的父亲不远千里从皖北来到浙东。每日上午,我陪他出门逛公园和广场;下午与晚上,我闭门修订书稿,他在另一个房间看电视。吃饭之时,两人各持一杯米酒,隔案相对,话并不多,他说家乡的变迁,旧遇的动向,我说这一年来的际遇与未来的筹划,一人说,一人只能倾听,卤菜的香气弥散于日益陌生的乡音,空气渐渐潮湿,窗外雨雪纷飞,烟花漫天,令我恍惚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是,眼前的父亲背越来越驼,白发越来越多,眼神也每况愈下。我写的前两本书,他都未能读完,有些地方,更是似懂非懂。但在我心底,我的每一本书都是为他,为他所代表的那一种力量与情感而写。哪怕他的眼神再不济,仅仅能看清书名。只要他在看,我就感觉充实,就有勇气继续提笔,讲述百年中国的白云苍狗,风雨激变,谎言对真相的压迫,正义像故园老屋后的那一条河流,越来越脏,越来越瘦,最后枯涸为一滴孤独的眼泪。然而,我们终将走出困境,走出黑暗,如同很多年前,父亲怀揣借来的几十块钱,拉上一家五口,离开了那个贫瘠的乡村,我的出生地,从未回头。

没有什么礼物,比这本以历史为主题的书,更适合献给我的父亲,献给他流逝的峥嵘岁月。”

写完这些文字,不知费了我多大的力量和勇气。我是那么善于制造文字垃圾,轮到书写生命深处的爱恨时却往往无力举笔。一字千钧,然而我不时陷入如潮涌至的疑虑,我们的书写对于所书写的对象到底有多重呢,正如对于书写者自身到底有多重?

我从未以此问题叩问沉默如山的父亲,并非不愿,而是不敢。因为父

亲轻轻一个答案,就可能摧毁我书写的全部欲望。同样,父亲从不主动和我谈论我的书,尽管他一直努力在读。他只是缓声说:你写这么多,不要累倒了。

假如我不写他,父亲一生,注定与文字无缘。

他幼年失怙。七岁那年,我的地主爷爷病死在江苏某农场,尸骨无存,至今不知魂归何处,那个浪荡子,也许鬼魂都如无根的飘萍。可怜奶奶含辛茹苦,要以一己之力,拉扯三女一子,我最小的姑姑,曾因家里养不起,被迫寄人篱下。可想而知,父亲的童年,遭遇了家庭与时代的双重病变,在凄风苦雨之中颠沛流离,辗转求生,实无一丝欢愉可言。

他断断续续读到了五年级,到十五岁那年,“文革”开场,像他这样的出身,便是一种无以复加的罪过,于是被发配下乡,从此与学校挥手作别。待我记事后,偶尔听他叹息:他的成绩一向极佳,若能继续读书,那该多好。只是叹息,并无怨天尤人的意思。父亲一生淡泊,与世无争,对于命运的百般磨难,真正做到了顺其自然,或可说是逆来顺受。

他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1985年,举家返城,身无长物,连路费都是告贷于亲友。与其说还乡,不如说从一重困境逃亡到另一重困境。那年我三岁,尚不记事,后来听奶奶话旧忆苦,才知当时的窘困。一家五人——两年后添了一个妹妹——寄居于两间破败的老屋,聊避风寒,因地势低洼,外面下暴雨,屋子便要进水。家徒四壁,仓皇度日,在我读大学后才搬离。搬到新房后,父亲特意买了一幅字挂在中堂: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想他未必知晓此言出自他经常提及的诸葛亮之口。

此后二十余年,父母干过各种苦力,做过各种生意,目的只有一个,供我们读书。我以县文科榜眼的成绩考上大学,他们欣喜若狂,因他们对我的期望,能读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便足矣,不想我却能考中县人梦寐以求的西南政法大学,只是父亲对我学法律专业,颇有些耿耿,却说不上所以然。我后来推想,大约在父亲看来,以我的头脑之笨拙、口齿之木讷、性情

之耿介,进不能匡扶正义,退不能混迹官场,学法四年,最怕一无所成,连吃饭的破碗都保不住。大学毕业,我弃法律而从新闻,家人颇多怨言,唯父亲的姿态无可无不可。这或不是先见之明,知子莫若父,父亲朴素的希望是,我未来的路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尽量少一些颠簸。用他所喜欢的诸葛亮的话讲,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我曾拿慕容雪村的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给父亲阅读,向他解释我为什么不干律师。父亲读后感慨,他未曾如小说作者的父亲那样悲剧,为筹学费而卖鸡和蛋,被公安局冤枉抓了,以致误了儿子的一生。我每念及此节,都忍不住大恸:

“……1984年,我刚刚初中毕业,中考成绩全县第一。在那间飘着炖鸡香味的土坯平房里,我上了人生的第一堂伦理课:做个好人。

那夜里我背着爸爸回家,他一直没说话,路上摔了一跤,半天爬不起来。他摸着我的脸问:儿子,你能考上大学吧?

我说:一定能!

他沉默了半天,一字一句地说:学法律。

我说:好,学法律!

那时我是个好人,一心杀贼,以为学了法律可以改变些什么……”

“做个好人”,永远是我今生的标杆。然而我终无法与法律彻底绝缘,就像我无法避而不闻这个世界此起彼伏的罪孽与邪恶。某一天我提起笔,冲决文学与哲学的罗网,参与公共事务,写关乎政法的时论——这大抵是一个犬儒的法律人曲线救国之路径——我对父亲解释,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父亲沉默了半晌,便也释然。

父亲老了。在我的记忆之中,他似乎从未年轻过。他大半辈子,只为扮演两个角色,在奶奶面前是儿子,在我们兄妹三人面前是父亲。2008年秋

天,奶奶去世,送葬那夜,寒雨纷飞,我背他下车,第一次感觉他的身体如此之轻,只有一把被榨干了精髓的硬骨头。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心里的负担如此之重;第一次领悟了那句刻在心底的箴言:父辈的苦难就是我们的原罪。

居宁波七载,我并不经常回家,而是希望父母多来玩。他们的劳碌岁月,没见过什么繁华世面,连像样的馆子都未曾下过。可是他们每次来,都急匆匆要赶回去;每次在外面吃饭,都怨声载道于菜价的昂贵与分量的吝啬。我给父亲打开珍藏多年的泸州老窖,他却托辞牙疼,更喜欢喝三块钱一斤的糯米酒;我问他什么菜最好吃, he说是沸腾鱼——那家使用地沟油的小小川菜店早就关闭了,如今改作棋牌室。父亲,我们何时能再吃一次?

我的好友,诗人宋尾,写过一首《给父亲的信》。其中两节,我感同身受:

你的身体里藏着一张地图。

我们每天都从那里经过

几十年,从没去勘探。

你把几十年的狂暴

都埋在了那里

安静得像我的孩子

我却如父亲那样的悲恸。

我依然记得我的悲恸。2010年清明前夕,我回家乡给奶奶扫墓。临别前一晚,与三位表哥喝酒,喝到一半,担心我喝醉的父母来了。父亲就坐在我的身边,一语不发。我不敢看他瘦骨嶙峋的脸,只顾埋头狂饮。那晚我自觉并未喝多,却不知为何,语音哽咽,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14岁那年,父亲在离家不远的农资公司当门卫。公司大院的偏僻一角有一个小破屋,我随之搬了进去,一直住到高中毕业。这两张照片,摄于1999年冬天,院内积雪皑皑,正是那个年代最铭感不忘的背景。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2004年7月25日

我不知道“沦陷”一词能否充分描述我的家乡如今所深陷的苦难之状。安徽阜阳,也许从来就不曾崛起,在2000年以后更是迎来了摇摇欲坠的多事之秋。肖作新市长与王怀忠副省长所引发的政治事故,使这座城市繁忙的公仆们难以享受短至一天的安宁。可怜而可悲的黎民百姓,面容已经麻木到不会因某些高级贪官的落马而欢颜,他们比所谓的思想先知还要清楚十倍,这样的世道,无论领袖的面目怎样变幻,明年的日子亦不过是今年车辙的重复,属于他们的贫瘠土地永远长不出繁华的花枝,他们只担心荒芜的再生。然而荒芜已经再生了——某一届公仆为了装点门面所处境心积虑建造的飞机场早因废弃而杂草萋萋,像毒蛇一般疯狂缠绕这块病态的热土。反腐败的风潮沉寂不到半晌,2004年的毒奶粉事件让这个城市在一夜之间再度“风光”无限。我在千里之外的山城重庆,看到照片之上那些被白布覆盖的婴儿与悲痛欲绝的家人,转过身,与那个告知我消息的、同是来自阜阳的朋友面面相觑,我们的眼神不再是惊慌,或者愤怒,而是一种绝望到底的空洞和漠然。那一刻,我将手边的一本书狠狠摔到地上,此书名曰《中国农民调查》,叙事对象依然是我的家乡。数月后,听说这本书由畅销而被法院临时禁止发行,以及作者吃了官司等,原告是书中重点书写的某个县领导,称此书内容不尽属实,诋毁了他的光辉名誉。这亦在料想之内。我的家乡近年来的历史,不管是喜剧抑或悲剧,最终都以闹剧收场。

我生活了18年的颍上县,居于阜阳市东部。据说是全国最穷的县之

一,同时却是全国畜牧水产十强县、粮食生产百强县、生态示范区、旅游名县等——这种吊诡的两面性,大概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颍上之于阜阳,正如阜阳之于安徽,乃至安徽之于中国,是以贫穷、民风的无赖与强悍、政府的腐败与善于作伪而声名卓著。18岁读大学以前,我走出县城的机会极少,印象当中似未踏出阜阳市的地界,故能安分于眼界的狭隘,因为没有与其他城市对比,便不知自己家乡的贫寒与黑暗是如此深不可测。

穷山恶水,多出刁民,这似乎是外界对安徽人尤其是皖北人最一致的评价。对此贬斥,安徽人却很少自责与反省,至少我与乡人们谈起这些,他们的表现,不是满不在乎,就是坦然受之,甚至有些洋洋自得。“刁”是他们挣扎于残酷的世道所信仰的排行第一位的生存法则。“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这则在我幼时广为流传的民谣所具有的启蒙意义,远远超过了教科书上义正词严的宣讲与宗族社会道貌岸然的遗训。我的少年时代,见惯不惊的不是风和日丽的行走与生活,而是肆虐于街头巷尾的欺诈、争吵、群架与仇杀。县人们依然在身体力行渐渐为文明的都市人所遗忘的江湖规矩: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我曾亲见一场血腥争斗,一个壮汉的左手臂膀被砍下了一小半,他却顾不得疼痛,右手仍奋力挥舞锋利的铁锹砸向对手。这种鲜血淋漓的武斗场面充斥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颍上县城。于我们那一代人的心灵撼动是,一部分人牢记这些生存经验并忠诚实践,终生不渝,另一部分则祈望早日逃离这块是非之地。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武斗的态势在执政者的强力整顿之下终于得以遏止,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来自民间的分析是:喜好打斗的人们认为暴力不能填充他们难平的欲壑,荣誉与危险共生,不若金钱实在,于是纷纷将野蛮的力气施展于南方大城市的建筑工地。打工潮的汹涌澎湃,在我离开家乡那一年(2000年)前后,蔓延到了令人惊悚的高度:到一个村庄,所能见到的多是老弱病残;甚至在日后,人迹罕寻,鸡犬之声难闻,一把铁锁锁住了一家人后半生的命运。有的农田干涸,有的草深过人,当然